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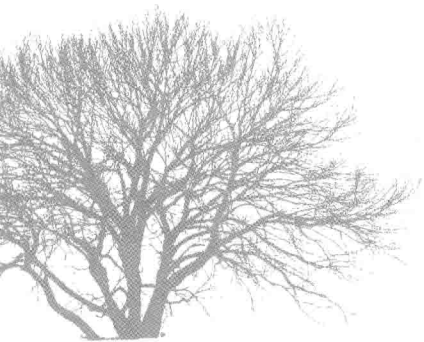
程翔章 / 著

湖北近代作家

HUBEI
JINDAI ZUOJIA
YANJIU

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UBEI
JINDAI ZUOJIA
YANJIU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湖北近代作家 研究

程翔章 / 著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近代作家研究/程翔章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22-6964-9

I. ①湖… II. ①程…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湖北省—近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014号

湖北近代作家研究

©程翔章 著

责任编辑: 廖国春

责任校对: 王 炜

装帧设计: 胡 灿

编辑室: 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 027-67863220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湖北民政印刷厂

督印: 章光琼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63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027-67861321

目 录

第一章 湖北近代文学研究概说	1
第一节 湖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文学传统	1
第二节 近代社会的巨变与湖北近代文学的转型	3
第三节 湖北近代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	5
第四节 湖北近代作家创作的局限与不足	10
第二章 湖北近代文学的开拓者——陈沅	13
第一节 陈沅的生平与著作	13
第二节 陈沅的诗歌理论	15
第三节 陈沅的诗歌创作	17
第四节 陈沅的其他文学创作	25
第三章 桐城——湘乡派的中坚——张裕钊	30
第一节 张裕钊的生平与著述	30
第二节 张裕钊的散文创作	33
第三节 张裕钊散文的艺术特点	37
第四节 张裕钊的诗歌创作	42
第五节 张裕钊诗歌的艺术特点	54
第四章 中晚唐诗派的代表诗人——樊增祥	58
第一节 樊增祥的生平与著述	58
第二节 樊增祥早、中期的诗歌创作	61
第三节 樊增祥的反帝爱国诗篇	66
第四节 樊增祥的后期诗歌创作	71
第五节 樊增祥的词	77

第六节 樊增祥的古文	84
第五章 国学大师与方志大家——王葆心	92
第一节 王葆心的生平与著述	92
第二节 王葆心的地方史志成就	96
第三节 王葆心的文学研究和乡邦文献保护	102
第四节 王葆心的文学创作	108
第六章 清末民初著名戏剧家——刘艺舟	116
第一节 刘艺舟的生平与戏剧活动	116
第二节 刘艺舟的代表剧作——《豹子头》	122
第三节 刘艺舟戏剧活动的突出特点	126
第七章 革命诗人与反袁斗士——刘成禺	129
第一节 刘成禺的生平与著述	129
第二节 刘成禺的诗歌代表作品——《洪宪纪事诗》	131
第三节 《洪宪纪事诗》的艺术特点	135
第四节 刘成禺的其他文学创作	138
第八章 同光体诗派的后起之秀——陈曾寿	143
第一节 陈曾寿的生平与著述	143
第二节 陈曾寿的诗歌创作	145
第三节 陈曾寿诗歌的突出特点	154
第四节 陈曾寿的词	157
第九章 中国出版翻译事业的开拓者——戢翼翬	165
第一节 戢翼翬的生平与著述	165
第二节 俄国文学的第一个中译者	170
第三节 戢翼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175
第十章 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田桐	177
第一节 田桐的生平与革命活动（一）	177
第二节 田桐的生平与革命活动（二）	182
第三节 田桐的散文创作	189
第四节 田桐的诗歌创作	196
第五节 田桐的其他作品	201

第十一章 国学大师与文学奇才——黄侃·····	205
第一节 黄侃生活的环境与早年教育·····	205
第二节 留学日本，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208
第三节 退入书斋，潜心教学研究·····	213
第四节 黄侃的散文创作·····	216
第五节 黄侃的诗歌创作·····	225
第六节 黄侃的词·····	236
第七节 黄侃的诗歌翻译·····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58

第一章 湖北近代文学研究概说

湖北位于中国大陆的中部、长江的中游，汉江的大部分流域在湖北境内。境内周边为山地丘陵，中部为辽阔富饶的江汉平原，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乃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而且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有九省通衢之誉，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先秦至清代中叶，湖北都是各个朝代文学的重镇，有着优良的文学传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进入近代后，湖北作家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勇于探索，积极实践，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节 湖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文学传统

“湖北”区域形成的历史很早，最早可追溯到夏代以前的“三苗”之域，即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的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代。当时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就是远古时代末期一座具有中心性质的文明古城。进入夏代，大禹规划天下土地，分为九州，“湖北”在荆州之域，主要方国为“荆楚”^①，正如《尚书·禹贡》所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至商代，“荆楚”属商王朝的“南土”之域。当时的“荆楚”国主要在汉水之西，而汉水之东却有“长江中游一个强盛方国的重要宫殿”——“盘龙城”^②。

①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 年第 2 期。

在周朝，诸侯国的楚国的发展变化很大。西周时，楚国的势力范围仍在汉水之西。至春秋早期时，其辖地已包括今湖北的全部与湖南的北部。后来逐渐扩展，至战国中期时达到鼎盛，楚国除拥有今湖北、湖南的全境和今河南、安徽的大部分地区之外，还据有江苏、浙江、江西以及山东的西南地区，而势力范围更拓展至重庆、汉中、岭南和云贵地区。尽管如此，其中心却一直在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

“湖北”的正式得名始于宋代。北宋初年，朝廷以洞庭湖为界，置荆湖南、北两路。“荆湖北路”又简称“湖北路”。清康熙三年甲辰三月甲戌（十二日），即公历1664年4月7日，湖广布政使司（省）分立为左、右两个布政使司（省）；康熙六年（1667年），湖广左布政使司更名为“湖北布政使司”，湖北不仅正式建省，而且“湖北”作为省名自此确立。故一段时间内，“楚国”专指湖北与湖南，今则特指湖北。

“湖北”简称“鄂”，别称“荆楚”，位于中国大陆的中部，长江的中游，长江由西向东横贯全省，汉江的3/4长度流经省境，另有清江、沮水、潯水、浠水、后河、漳河等1190多条中小河流，纵横于全省各地。鄂境的西、北、东三面为武陵山、巫山、荆山、秦岭、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山地丘陵环绕，地势高起；而中间则较低平，且逐渐向南敞开。中部为平坦富饶的江汉平原，其上湖泊众多，使鄂省具有“千湖之省”的赞誉；而江汉平原又与湖南的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鄂省境内不仅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全国少有的鱼米之乡；而且航空、航运、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极为便利，自古就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在中国古代，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荆楚学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学艺术传统，曾出现过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宋玉（生卒年不详，稍晚于屈原）、王逸（约89—158年）、柳恽（465—517年）、庾信（513—581年）、杜审言（645？—708年？）、孟浩然（689—740年）、綦毋潜（692—749年）、张继（生卒年不详）、岑参（约715—770年）、戎昱（744—800年）、皮日休（834或839—902年）、宋祁（998—1061年）、袁宗道（1560—1600年）、袁宏道（1568—1610年）、袁中道（1575—1630年）、钟惺（1574—1624年）、谭元春（1586—1677年）、

杜濬（1611—1687年）、顾景星（1621—1687年）等驰名海内外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家；也产生过《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九思》、《江南曲》、《乌夜啼》、《拟咏怀》、《木兰辞》、《哀江南赋》、《小园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登襄阳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夜归鹿门寺》、《过故人庄》、《春晓》、《春泛若耶溪》、《题西霞寺》、《枫桥夜泊》、《阊门即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逢入京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塞下曲》、《移家别湖上亭》、《橡媪叹》、《忧赋》、《九讽》、《汴河怀古》、《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蝶恋花·情景》、《九日置酒》、《极乐寺纪游》、《虎丘》、《初至西湖记》、《灵岩记》、《满井游记》、《竹枝词》、《徐文长传》、《晚游六桥待月记》、《大别山》、《游鸣凤山记》、《楮亭记》、《玉泉涧游记》、《游石首绣林山记》、《听泉》、《感怀》、《秋海棠》、《夏梅说》、《浣花溪记》、《游乌龙潭》（三篇）、《游九峰山》、《初闻灯船鼓吹歌》、《楼雨》、《春秋论》、《蔡邕论》、《半舫斋诗序》等一大批经久不衰的名篇名作，为中华民族璀璨辉煌的文学艺术宝库增添过不少光彩，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近代社会的巨变与湖北近代文学的转型

进入近代后，不仅社会，而且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近代社会，即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史学界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于阶级矛盾和思想斗争的异常尖锐、激烈、复杂，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日益加深，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逐步发生变化，致使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原来独立、自主、完整的封建帝国被破坏，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逐渐解体，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与史学界相适应，文学界则将发生、发展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

文学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文学史”。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进程和西方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那些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们仍然对封建的伦理纲常、道德文章顶礼膜拜，十分留恋，并想方设法去阻碍西方进步文化和先进文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文学变革的历史潮流，文学创作的逐渐转型，封建文化的日趋解体，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止的。终于，中国封建主义的古典文学逐渐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所代替；或者说，中国的古典文学终于顺应世界文学潮流，逐步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近代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烈爱国精神，愤怒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和腐败无能，艺术地再现了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过程，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中国近代文学不仅以其自身鲜明的特点为中国的古典文学作了光辉的终结，而且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过渡的一座桥梁，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逐步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湖北近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一致，根据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种种原因和局限”所导致的文学发展的不平衡，“以先后自然形成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改良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为中心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为标志^①，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前后，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第二个时期是洋务运动前后，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学；第三个时期是戊戌变法前后，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时期的文学；第四个时期是辛亥革命前后，即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

^① 程翔章、丘铸昌：《中国近代文学》第4~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命时期的文学。

在这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里都出现了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或重要影响的湖北作家，他们以其自身的创作实绩，共同促进了湖北近代文学的兴盛繁荣，也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繁荣昌盛和中国古代文学的逐步走向近代化与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湖北虽然没有再产生过像屈原那样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和像《离骚》那样杰出的作品，但是受时代风气和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湖北近代作家不仅努力继承和发扬湖北古代作家的文学艺术传统，而且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更新思想观念、文学观念，辛勤探索，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风貌、为读者欢迎和喜爱的文学作品，并有一些新的开拓，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为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奠定了湖北作家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三节 湖北近代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

综观湖北近代有代表性的诗人（含词人）、散文家（含政论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的文学创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中间虽然也有少数作家不受任何文学流派或文学社团的影响，比较独立，能够自成一家；但大多数作家还是分别隶属于中国近代的经世文派、桐城一湘乡派、中晚唐诗派、同光体诗派、临桂词派、魏晋文派、南社和上海新剧俱进会等几个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或戏剧团体，并成为其中的代表作家或中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的文学创作反映了湖北近代文坛（含诗坛、剧坛、译坛）的基本风貌，也代表了湖北近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与成就。

前文已经说过，湖北地处中国内陆的腹地，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相对开放的环境，使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殖民地化，湖北地区成为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向内地渗透、扩张的重要区域。而荆

楚大地优越的文化意识，又对异域文化或新型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因此，新、旧文化阵营和文学势力的相生相搏与兴盛消亡，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和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学相互争斗与交相并存，也就形成了湖北近代文学的基本风貌。具体说，从湖北近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来看，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救亡图存、反帝爱国成为湖北近代作家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自鸦片战争始，公开臧否人物，反映世变，抨击时弊，议论朝政，反对卖国求荣，呼吁救亡图存就成为湖北作家的一种优良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桐城一湘乡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张裕钊，曾写过《送张生謦之山东序》、《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送吴筱轩军门序》、《日本冈鹿门千仞藏名山房文钞序》、《养浩堂诗集序》等一系列文章，不仅极力呼吁清政府要学习西方，通过改良变法，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而且反复告诫朝中重臣、封疆大吏和地方官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协恭同德”，保卫国防，使“海隅清晏”。中晚唐诗派的代表诗人樊增祥自中法战争失败至八国联军入侵前后，就相继写有《甲申元旦试笔》、《书愤》、《陆沉》、《马关》、《闻都门消息》、《庚子五月都门纪事》、《中立》、《营州》、《中秋夜无月》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像他的诗句“君家世世修降表，始自南唐直到今”^①，就成为当时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卖国行径的名句。辛亥革命时期，以黄侃、曾学鲁、刘艺舟、刘成禺、戢翼翬、田桐为代表的湖北一批同盟会革命志士和南社诗人用自己的诗文创作来响应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尤其是黄侃，在其晚年，创作了《闻警》、《书愤》、《辛未岁暮书感二首》、《牡亡》、《乙亥九日》等一大批愤怒谴责日本侵略罪行的诗歌作品，抒发了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的爱国情感。

其次，关注并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揭露黑暗，抨击时弊，同情民生疾苦，忧时伤世也是湖北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中国的近代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阶段，湖北近代作家用自己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内忧外患、国势日衰的时代生活面貌。如陈沆的诗歌就充分地反映了清嘉庆（1796—1820年）后

^① 樊增祥：《陆沉》，《樊樊山诗集》第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期与道光(1821—1850年)初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其《兰阳守风》、《河南道上乐府四章》、《出都》(六首)、《有感(闻广东荒歉,海寇未平)》、《扬州城楼》等作品就是当时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状况的具体写照。王柏心的不少作品则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战争给社会,尤其是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动荡不安与灾难。樊增祥亦有不少描述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纪实性诗歌作品,如其《闻都门消息》(五首)、《庚子五月都门纪事》(八首)、《二十四日日本攻旅顺毁俄舰三》、《营州》(二首)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黄侃也写过不少反映军阀混战给老百姓造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甚至尸横遍野惨状的作品,如《乱后始至南京作》、《十一月十七日即事》、《谁信》、《行路难》(长安城头落日黄)、《书愤》(谁令蛮触日相争)等。

又次,“中体西用”成为湖北作家文化选择和文学选择的主要心理价值取向。自鸦片战争开始,整个中国近代的80年间,文坛上关于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论争、碰撞就异常激烈、复杂,湖北的近代文坛也不例外。虽然湖北近代早期有些作家因受中国封建文化影响太深,传统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思想比较僵化,坚守的是“以夏变夷”或以不变应万变的观念;后期则有一些作家、尤其是民主革命派的作家,其中不少人曾走出国门,沐浴过欧风美雨,受西方先进文化影响较大,思想比较开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进步的物质文化,还主张学习西方进步的制度文化,希望借鉴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或建立一种适应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新型文化与文学。但是,湖北近代更多的作家是在承认中国的技艺比西方落后的同时,仍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学遗产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因而,在文化与文学的选择上,坚守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原则。如桐城一湘乡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张裕钊,其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受曾国藩影响很大,他就明确主张“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①。在文学观念上,崇尚汉赋和韩愈;创作时,则将西方的文化融入中国传统的文章内容和文学风格之中。又如中晚唐诗派的代表诗人樊增祥,受时代风气和恩师张之洞的影响,亦信守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筹洋刍议——薛福成集》第9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体西用”的原则。他曾坦诚地说：“今人皆诋吾为守旧，不知吾作事甚似西人；其不合于时贤者，世皆袭西人之貌，吾则取其意也。”^① 诗歌创作的内容较驳杂，既有纪游山川、赠答题咏的闲情之作，甚至有不少放荡颓唐的浮艳之辞，亦有关心国事、忧虑民生之作。再如同光体后起之秀的陈曾寿也是如此，其诗歌作品中，就有一些作品是用中国传统的风格形式来反映西方先进器物的。

再次，湖北近代作家在文学审美品格的追求上，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一方面，受时代的影响，作家必须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生存而呼喊。因此，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并将其作用扩展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影响每一个作家。在文坛上，视文学为“经世致用”、“匡时济世”、“除弊御侮”工具的文学观念，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用说陈沆是湖北作家“经世致用”的先驱与楷模，就连恪守古道、以文坛正宗和“中流砥柱”自居的桐城一湘乡派代表作家张裕钊也自觉地用诗文来“匡时济世”。樊增祥等人虽然极力标举中晚唐诗风，却又积极参与政事，在诗作中表露出颇高的政治热情。至于刘艺舟、刘成禺、戢翼翬、田桐、黄侃等同盟会或南社的民主革命派的文学家，其文学创作的社会功利性倾向就更加鲜明了。

另一方面，湖北近代作家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作用的同时，亦在积极地进行着审美品格的探索，非常重视对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写作技巧的研究。如陈沆就是“将敦厚、纯正、平和与无邪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的^②。樊增祥则主张“诗贵有品”，虽然也曾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的爱国诗篇，表达其忧国忧民的情感，但其诗仍以“清新博丽”为主，其人亦是以“工于隶事，巧于裁对”^③ 享誉诗坛的。在其诗歌中，不仅七律的数量多，而且公认写得好，极尽工巧。请看他的《儿辈初学属对时余书云：“墨竹换诗诗换蟹”，皆不能属，戏赋》：

近来闽粤竞诗钟，未许儿曹学步工。墨竹换诗诗换蟹，画松如篆篆如龙。天衣巧制须无缝，玉合精求必可逢。自古文章珍偶丽，南彭

① 樊增祥：《五十磨斋词麈·跋》，《樊樊山诗集》第17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程翔章：《陈沆诗歌创作简论》，《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2期（上）。

③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第1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北纪勉相从。

这首诗的整个对仗已经非常工巧了，但诗人仍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再示儿辈》，更在其颌联上求工巧：“墨竹换诗诗换蟹，黄金偿剑剑偿牛。”由此可见，诗人们对诗作的格律严谨、对仗工巧、音韵和谐非常重视。

桐城—湘乡派的代表作家张裕钊自诩“生平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又决心“捐弃一世华靡荣乐之娱，穷毕生之力”而为之^①；为文主张雅健与雄奇，并以其文章的形式美与吴汝纶并雄于同（治）光（绪）文坛。而陈曾寿主张诗词的创作必须蕴藉、含蓄，并以雄深雅健、温婉深微的诗（词）风享誉诗坛。而南社诗人刘成禺可说是将古代七言绝句体运用到了极致。单独看，七言绝句好像比较好写，但能使 200 首绝句在内容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易事。

此外，湖北近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诗体、文体皆较全。在诗歌创作中，湖北近代诗人都能根据诗歌所反映的不同内容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诗歌体裁。例如陈沆的诗歌中，不仅有五言、七言古诗，也有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还写有不少五言馆课试律诗。而黄侃除了写过很多五言、七言古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之外，还写过一些四言诗、五言排律。对这些诗体的运用都很灵活、自如，得心应手。

在散文创作方面，虽然有一些作家在某一种文体上不仅创作的数量多，而且影响大，如陈沆的赋、王柏心的五言古体诗、樊增祥的骈体文、王葆心的人物传记，但多数作家还是能够根据文章所反映的不同内容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文章体裁。如古文大师张裕钊的作品中，就有论、辨、考、策、记、传、序、跋、题、赠序、寿序、后序、家传、事略、书、书后、碑记、墓表、墓志铭、神道碑、祭文、诔文等文体。又如魏晋文派代表作家黄侃的作品中，就有论、说、释、赋、铭、赞、跋、题辞、识语、序、后序、书、书后、题记、墓表、墓志铭、吊文、奠文、哀辞等各种文体。

总之，湖北近代作家紧跟时代步伐，或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及时反映社会的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专制统治；或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倡导民主自由，同情民生疾苦；或游览名山大川，赞美祖国壮丽河山，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作品，表现出深厚的爱国思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① 张裕钊：《与黎莼斋书》，《张裕钊诗文集》第 80～8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代表了湖北近代诗文创作的水平，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兴盛、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近代化、现代化转型，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第四节 湖北近代作家创作的局限与不足

就整体而言，湖北近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广东、湖南、江浙、福建等省份的近代文学成就相比，较明显地缺乏世纪之交时代巨变、文学转型时期所应当具备的那种昂扬悲壮的活力和朝气；虽然也出现了像陈沆、王柏心、张裕钊、樊增祥、张仲炘、王葆心、刘艺舟、刘成禺、陈曾寿、戢翼翬、田桐、黄侃等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剧家、翻译家，但却缺乏像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王韬、曾国藩、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章太炎、曾朴、秋瑾、柳亚子、王国维等中国近代文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首开文坛变革风气的著名文学家。即使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北文坛也未出现与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相呼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学运动的高潮；很明显，湖北近代的文学活动与民主革命活动相比，要逊色得多。具体说来，湖北近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的局限或不足：

首先，湖北近代作家缺乏先进的文学观念和变革意识。前文已经介绍过，学者们根据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并“以先后自然形成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改良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为中心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为标志”，将中国近代文学又划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1840—1860年）、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时期（1860—1894年）、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时期（1894—1905年）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1905—1919年）等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①。而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曾产生过一批开

^① 程翔章，丘铸昌：《中国近代文学》第4～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时代风气之先的重要作家，如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冯桂芬、王韬、曾国藩等，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时期的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章太炎、曾朴、秋瑾、柳亚子、王国维等，但这些人中未见有湖北人。从中亦可看出，湖北近代作家文学变革的意识不强，缺乏那种敢于创造先进的文学观点和进步的文学观念的气魄。也正因如此，它直接影响到湖北近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和成就，自然也就影响到湖北近代作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湖北近代作家就没有什么理论成果，事实上，湖北近代也有不少作家非常重视对文学理论、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的研究探讨，注意总结前人诗歌、散文创作的经验，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诗歌、散文创作实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陈沆、张裕钊和黄侃。张裕钊的散文理论，尤其是陈沆的《诗比兴笺》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等理论著作，一直为学人们所推崇，在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理论只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的探讨和总结，而不是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出现的对新事物、新思想、新观点、新观念、新理论的探讨和阐发，或受西方进步思想、先进理论影响而在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的大胆创新。

其次，湖北近代文学的地方色彩不够鲜明。在中国古代，湖北文学创作的地方色彩是很浓厚的，曾产生过一些影响全国的文学样式，如先秦时期的“楚辞”，唐代的田园诗和边塞诗，明代“公安派”和“竟陵派”创作的小品文，等等。而在湖北的近代文坛上，虽然产生过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但却没有产生过某一种足以影响全国并形成了地方优势的文学体裁。具体说，就是地方优势不明显，地方色彩不突出。总体说来，湖北近代作家除诗（词）文的创作相对突出一些外——作家多，作品亦多；叙事性的小说、戏曲和翻译文学则比较薄弱——作家少，作品亦少；尤其是在小说的创作方面更显薄弱，整个近代的80年间，湖北就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小说家和作品。这可能与湖北地处中部，虽然文化比较发达，出外为官者也较多，但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却相对保守，只重视被封建文人称为文学“正统”的诗（词）文的创作；却看不起那些被封建文人视为“小道”、“雕虫小技”，却为广大